

國家角色與產業發展之連結：比較台灣與
韓國之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High-tech Industry: the Case of TFT-LCD
Industry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王綺年

Wan, Chi-Ni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本篇文章經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家角色與產業發展之連結——以台灣與韓國之 TFT-LCD 產業為例」(NSC 95-2414-H-034-004-) 補助，特此感謝。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High-tech Industry: the Case of TFT-LCD Industry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Wan, Chi-Ni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ompetitive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Especially entering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business all depend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what we saw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used to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guiding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most of the governments adapted the same industrial policy which emphasized the achievement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through export-oriented trade strategy. Simultaneously, these countries attempted to enhance the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and to reach the catching-up goal by means of imitation and assimilation. Compa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we can find lots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not only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but also in indicating the focusing industries. In 1960s and 1970s, both countries' economy is driven primarily by petrochemicals, iron and steel and automobile industries.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1980s is paid to the industry upgrad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are built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industry and economy.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take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FT-LCD industry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s the case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ustry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Keywords: Developmental State, Industry Policy, TFT-LCD Industry, R&D

國家角色與產業發展之連結：比較台灣與韓國之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

王綺莉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來，不論企業或國家皆強調競爭力的重要性，特別在邁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之際，競爭力儼然成爲企業乃至國家經濟持續與發展的重要憑藉。然而，過去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是倚仗國家爲主導經濟的力量，以快速工業化爲經濟發展主軸，並且運用策略性的貿易政策作爲手段，扶植自身的製造業基礎，透過技術模仿與吸取過程，以「追趕」西方先進國家爲目標。而綜觀東亞各國產業發展，其中台灣與南韓的經濟型態不僅依循如此的發展軌跡，且此一階段主導產業類別的選擇上亦呈現相類似的結果。六、七〇年代兩國產業主要由石化、鋼鐵與汽車等產業作爲經濟的主要驅動力；至八〇年代也逐步進行產業升級，而同時發展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來達成產業與整體經濟成長的目標。此外，本研究以近年來發展相當快速，對於南韓與台灣之國家經濟發展影響甚大，也有此一國企業間造成頗鉅之競爭態勢的薄膜液晶顯示器（TFT-LCD）產業爲例，藉由該產業成爲政府政策關注的焦點，並且在世界市場的佔有率分別位居前二名，來探討國家對產業發展與企業互動等方面在後發展性國家論述中所可能出現的現象。

關鍵詞：發展型國家、國家產業政策、TFT-LCD產業、企業研發

壹、前言

近年來，不論企業或國家皆強調競爭力的重要性，特別在邁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之際，競爭力儼然成為企業乃至國家經濟持續與發展的重要憑藉。過去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是倚仗國家為引導經濟的力量，以快速工業化為經濟發展主軸，並且運用策略性的貿易政策作為手段，扶植自身的製造業基礎，透過技術模仿與吸取過程，以「追趕」西方先進國家為目標。而綜觀東亞各國產業發展，其中台灣與南韓的經濟型態不僅依循如此的發展軌跡，且此一省省引導產業類別的選擇上亦呈現相類似的結果。特別是自八〇年代，台灣與南韓不約而同進行產業升級，發展半導體、顯示器的高科技產業，以達成產業與整體經濟成長的目標。

然而，正值兩國政府積極提振經濟之際，其威權主義政府進入八〇年代的同時，也相繼遭遇民主化浪潮的衝擊，出現與之相對抗的社會力量。但兩國卻呈現相當不同的樣態：在台灣，係以本土意識為主要訴求的在野政黨面貌出現，挑戰所謂的外來政權，並強化本土執政的合法與合理性；而在南韓，則以勞工運動的風起雲湧與財閥勢力壯大而逐漸脫離國家控管的面貌呈現，進而也影響兩國「發展型國家」政府角色的變化與轉型程度的差異性。

職此，本文將以肇始於七〇年代，台灣與南韓所相繼提出的科技與產業政策，以及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作為觀察國家能力與內涵變化的主要架構，藉以觀察該產業在兩國同時經歷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雙重挑戰之際，是否因此產生不同以往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並且影響國家直接介入經濟活動的形式與程度。此外，透過比較兩國的科技政策與特定產業的發展，以及政府產業政策對企業發展的差異性，或可發掘出兩國之國家能力在同樣經歷民主化的過程之後，國家與企業間互動之實質性轉變為何，實質「發展型國

家」的影響力是否仍持續留存。

因此，分析的面向從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角度出發，希冀釐清(1)台灣與南韓是否因國家進行民主化之後，國家對於高科技產業的政策能力有逐步退卻的情況；(2)抑或經歷民主化的過程，因國家權力逐步受到來自社會力的抵制之際，政府與高科技產業之間的關係出現何種面貌，以及之間透過政策性的互動為何。

貳、發展型國家論述之演變

探討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向為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核心議題，其中將國家視為基本分析因素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關鍵研究取向，特別是透過對於國家官僚體制、產業政策的形成，以及與社會部門之間的關聯性來分析經濟產出的結構性議題，更凸顯出國家在政治經濟學備受重視的一面。

八〇年代，「喚回國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理論思維掀起社會科學界對國家研究的重視，¹國家中心主義論者亦強調政府在經濟運作過程中所扮演的重疊角色，加之在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成就推波助瀾下，國家的具體性遂成為眾多學習研究的對象。雖然，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亦曾引起學界的理論適用性的爭論，²惟不容置疑的是，亞洲各國政府曾經扮演著經濟推手的關鍵

-
1. Peter B. Evans, D. Rues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參見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ov/Dec 1994), pp. 62~78; 其他相關的理論貢獻可參見Robert Garran, *Tigers Tamed: The End of the Asian Miracle*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8); Paul R. Krugman,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0).

性角色。³

然而，不可否認地，東亞四小龍中的台灣與南韓自八〇年代末期相繼展開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工程，確實對發展型國家中政府在產業發展中所扮演的引導角色造成衝擊，國家相對社會的自由性與國家介入經濟活動的能量，是否能持續維持，並且能達到國家期盼的效果，自然在相關的理論界引發各種不同的論調⁴。再加上邁入九〇年代，新一波以知識經濟與科技發展、積極開放國內市場為內涵的全球化浪潮，也挑戰發展型國家所扮演的引導角色。WTO與IMF等國際經貿組織或是跨國企業也倡自由貿易的口號支持下，逐步侵蝕發展型國家的自由能力，東亞國家在經濟奇蹟背後所展現的政策支持角色，至此也成為學習們持續觀察的對象。

一、發展型國家論述

學術界有關國家理論的論述性文章汗牛充棟，其可以計數價值看待國家介入經濟活動的學習人多以研究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為旨。⁵在肯定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經驗的貢獻當中，發展型國家是一個強有

3.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4. John Minns,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6 (2001), pp. 1025~1043; Judith Cherry, "'Big Deal' or big disappointment? The Continuing Evolu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3 (Sep 2005), pp. 327~354; Bae-Gyoon Park, "Spatially Selective Liberalization and Graduated Sovereignty: Politics of Neo-liberalism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South Kore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4 (2005), pp. 850~873.

5. 在這方面的學習係眾人所熟知的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eter Evans, *The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力的論述，其中首推 Chalmers Johnson 對日本的研究論述，⁶他透過對通商省的分析，認為發展型國家的重要條件有四：優秀的官僚、國家自主性、干預市場，以及經濟計劃的機構。而後有 Alice Amsden 對於南韓的經濟計劃院，Robert Wade 對於台灣經建會的論述，分別為研究發展型國家的典型範例，基本論點都涵蓋於 Johnson 所提出的要件中。三省皆強調國家透過技術官僚在產業政策上的前瞻性作為，得以主動引導國家的重點產業的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另藉助國家機器對資源配置權力的掌控，以充分發揮國家所扶植之產業的競爭優勢，並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相當程度壓抑社會力的展現，其結果為社會相對於企業的發展一直處於弱勢地位，且陷於無法充分表達自身權益的處境，而其最終目的就是為貫徹國家的各項施政。

凡此研究強調的是國家的自主性 (autonomy)，亦即一個國家能夠拒斥賄賂的行為，並且克服集體行為的問題，以及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的強度，即國家能否隨時有效地動員國內一切人力與物力，全力投入國家經濟建設，而不致受到社會力的阻難與挑戰，當然也包括能自外於國際的壓力，防止外國勢力輕易介入本國政治與經濟資源的能力。

二、發展型國家角色的轉型

然而，隨著全球經濟運籌模式的轉變，以及後發國家在其自身經濟發展中所創造出日益茁壯且相對立的社會力量，也開始出現所謂國家自我轉型的議題。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尤其關切於國家與社會聯繫的強度與持續力，便成為測試國家相對自主性的重要變

6.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60.

數，誠如Peter Evans所言，即為鑲嵌性（embeddedness）的討論。⁷

面臨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之後，東亞各國面對嚴峻的金融問題挑戰，Linda Weiss便認為發展型國家確實正進行經濟策略上的轉型，開始著手進行金融控管的去管制化與自由化的做法。只是在自由化的影響下，國家是否真正地退居幕後，Weiss則認為這種想法過於樂觀，原因在於金融自由化並未影響國家在經濟引導的程度，且深受其害的國家多為東南亞國家，諸如印尼、泰國，以及馬來西亞，這些國家並非典型的發展型國家，而南韓卻是正國家的帶領之下走出風暴的陰影，這些都是以論證國家角色並不因此而弱化。⁸

從台灣的產業政策角度分析，瞿宛文則指出政策雖不必然，但有可能成為有效推動產業的工具，因此可以是決定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台灣藉由政策所扶植的產業在當時皆被視為是高風險投資，鮮少本地私人企業願意參與，而由政府藉由公營企業的模式直接進行投資與經營，是將風險社會化的作法，也是當時推動這些產業的有效辦法。此作法雖在這些產業的發展上不盡理想，但基本上，產業政策仍是落後國家追趕先進國家，促進產業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⁹此外，劉鴻暉從公共政策、國家能力與政府對社會的相對自主權三個角度加以論述國家對產業發展的助益，儘管在台灣的民主化的過程中導致威權體制的撤出，然而以中小企業組成的台灣產業結構，面對知識經濟盛行的今日，基於國家競爭力的考量，政府透過產業政策所履行的國家能力並未消退，只是將政策的目標產業轉移至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上，政府在選擇策略性產業的決策

7. Peter Evans, *The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Linda Weiss,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ransition: Adapting, Dismantling, Innovating, Not Normalizing,"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1 (2000), pp. 29~39.

9. 瞿宛文，「台灣產業政策成效之初步評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頁67~117。

能力依然相當自由。¹⁰

針對南韓自從專政總轉型過程，國家自由性與能力是否開始從經濟社會場域退縮的問題，學者們亦有不同的看法。Kim則透過對中央政府經濟部門的人事與機構重組現象，來觀察南韓的國家能力自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是否出現退卻現象。作者認為，即便IMF最初提出的改革方案中，的確包含針對國家主導角色的削弱，且政府在處理公部門的問題上，也表現出頗為積極的改革立場，但成效不彰，唯一實質變化的情況是，經濟部門協調與金融控制的有效能力的確逐漸下降。但作者仍認為，南韓作為典型的發展型國家，並未因金融風暴而喪失她的本色。¹¹

然而，亦有學者認為南韓專政總改革過程中，民間社會確實展現出強大的自由性，以拒斥國家力量積極介入之行為。Park在研究南韓的政經發展過程，即提出等級主權（graduated sovereignty）的概念，認為自面臨全球化與經濟自由化之際，國家的主權會進行適度調整，來加以因應全球經濟體系所呈現的新型態。尤其自金融風暴後，南韓即積極展開國家經濟全球化的行動，讓渡部份的國家權力，明証為政府所設立的經濟特區賦予外資更多經濟特權的特別區塊。¹² Cherry則自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並從中央政府透過大交易（Big Deal）強制財閥進行股權交換之契機過程中，發現即便南韓政府借助IMF的強制力量，也無法全然施展政府的力量來解構大財團主權層層架接的狀態。作者並且認為南韓國家能力的轉變

10. 劉鴻暉，「民主化與產業發展之政治經濟分析」，朱雲漢、柯宗和編，*民主轉型與經濟衝突—一九〇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台北：桂冠出版社，2000），頁181~208。

11. Eunmee Kim and Jiyoung Kim, "Developmental State vs. Globalization: South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98," *Kore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32, No. 2 (2005), pp. 43~70.

12. Bae-Gyoon Park, "Spatially Selective Liberalization and Graduated Sovereignty: Politics of Neo-liberalism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South Kore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4 (2005), pp. 850~873.

早在九〇年代初期，基於南韓開始進行經濟自由化行動便已加速國家權力的削弱，且弱化政府對經濟行為之調節的能力。而在八〇年代金融風暴後所採行的相關經濟政策，更進一步促使南韓由發展型國家開始產生角色的變化，成為轉型式國家（transformative state）。¹³

綜上所述，隨著知識經濟的崛起、全球化腳步的加快、以及科技的突飛猛進，新經濟在21世紀所佔有的地位不容小覷，國家面對更大的挑戰，其將扮演何種角色，與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將呈現新的風貌。但在資訊社會的形成的同時，全球資本、貨物、服務、資訊和技術的流動，國家在時空的掌控上是否會因此而減弱，各學者的論述仍有相當的差異性。

參、相關政策與產業的發展歷程

一、台灣與南韓科技政策的演變

（一）台灣高科技產業政策之沿革

七〇到八〇年代，台灣產業主要係自由化、鋼鐵與汽車等產業作為經濟的驅動力，然而這類資本性密集的產業對於技術的投入較少，主要引進國外的技術，因此較不具國際競爭優勢。¹⁴自七〇年代後期始，我國經歷兩次能源危機，產業面臨勞工薪資不斷提高、工業用地價格上漲與來自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競爭等問題，勞力密集型產業已逐漸失去國際競爭力，為維持國內經濟成長，政府一方面鼓勵傳統產業升級，以延續產業生命；一方面引導國內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發展，以提昇產業附加價值及國際競爭力。高科技產

13. Judith Cherry, "'Big Deal' or Big Disappointment? The Continuing Evolu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3 (September 2005), pp. 327-354.

14. 此即蔣經國謂之「新重商主義」，亦即政府與企業皆依據政治權力的邏輯在運作，因相互結合而刻意忽略經濟性作用，故企業界絕大多數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受到保護，只求短期利潤，不願從事風險性較高或不確定性較大的長期投資行為。見蔣經國，*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國際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90）。

業發展初期，由於民間資本取得不易，且技術風險性過高，因此民間企業的投资行為普遍裹足不前，但政府一方面握有社會資源調動的權力，另一方面亦為推動產業快速轉型，因此在相關產業政策上提供企業相當多的優惠措施。

為了促進策略性工業的發展，加速產業轉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相關措施，透過設置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立資訊工業策進會，並由工業技術研究院下成立電子研究所、材料工業研究所和機械工業研究所的產業技術研究機構；設立中國輸出入銀行，改組交通銀行為政策性開發銀行，俾對策略性工業及重要非首行業提供長期低利融資和參與投資的方式；並且進一步修訂獎勵投資條例，對於高資本、技術密集工業減免所得稅，來強化產業升級的國家目標。新竹科學園區的成立提供一個進行研發及培訓本土專業人才的環境，並招募自國外受教育和經驗豐富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回國服務，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遂在官方計畫與政策推動下，促使台灣高科技產業得以發展。¹⁵在政府的有力扶植之下，資訊電子產業遂成為台灣相當重要的工業製造者。

民國八十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化的過程。基本上，國民黨執政的此一時期的產業政策仍延續以往的政策做法，陸續提出諸多重大建設方案，以及擬定更多的科技發展項目，以期台灣經濟持續的發展。其中，民國八十年的第四次全國科技會議將原「十年科學技術發展長程計劃」加以修改，延伸為「十二年長程計劃」，並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劃制定了「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六年中程計劃」，為提高我國的科技水準，強調推動重點科技研究及強化各項配合措施，但其目標除提高科技水準外，仍不脫經濟發展與強化國防能力的實用性價值，且延續八〇年代的科技政策方

15. 張俊彥、游伯龍編著，**活力：台灣如何創造半導體與個人電腦產業奇蹟**（台北：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與時報文化出版社，2002），頁151。

針，強調應用性技術的重要性。¹⁶民國八十一年，國家科學委員會亦針對台灣地區科技人力之需求，為適應國內外經濟環境變遷，加速產業升級，依據市場潛力、產業關聯性、附加價值、技術層次、污染程度、能源依存度等因素，更提出將「十大新興產業」及「八大關鍵性技術」列為台灣未來產業發展優先推動之重點項目的建議。¹⁷

民國八十六年正式籌設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該年六月並頒佈科技白皮書，提出十二大科技發展策略。¹⁸國科會亦於民國八十七年通過「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希冀透過國家的力量來整合各界資源，以落實科技白皮書中各項重要科技活動，與推動科技研究的整體發展。此外，並於民國八十八年頒佈科學技術基本法，進一步強化國家的角色，並強調政府應協助研究機構與公、民營企業之研發單位充實人才、設備與技術，以促進科學技術的研發。在扶植產業發展上，民國七十九年基於獎勵投資條例已不符時代之需求，政府遂提出日後對產業發展相當具影響力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下簡稱為「促產條例」），該條例基本上係一希冀透過對企業提供相關優惠措施來帶動產業升級的政策工具，以凸顯並延續國家能力在產業發展的重要性。¹⁹其次，為改善國內產業經營環境，提昇其競爭力，政府亦提供研發補助金、產業升級融資等若干金融協助措施。再加以經濟振興方案的推出，更提出促進民間投資，在推進產業升級的同時，誘導跨國公司進入台灣，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製造、運輸、金融、通訊等營運中心。

1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編，**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八十二年版）**（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94），頁6~9。

17. 劉大升，**美、日政府協助業界（含中小企業）開發產業技術之相關制度研究**（台北：經濟部副機委會委託研究計劃，2000），頁26~28。

18. 嚴正鈞編，**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頁433~440。

19. 王健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租稅優惠措施實施成效評估及其修訂方向對台灣經濟的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第5卷第1期（1999年），頁75~87。

其中，針對推動LCD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自民國七十八年，經濟部科研專案即委託工研院進行TFT型LCD的相關技術，與嘗試研製關鍵零組件。政府亦於民國八十年開始，便陸續編列計七十億元的經費，委由工研院進行研發，再將技術移轉給產業界，並引導相關產業聯盟社團的成立，帶動產業的發展與廠商之間的聯繫。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對於提昇產業發展也提出不少相對應的措施。首先，在國家整體發展方面，透過產業政策白皮書的宣示，政府推動「兩兆雙星」計劃，其中兩兆計劃即是在圖使半導體、影像顯示產業（LCD、TFT-LCD等產業）產值各突破新台幣兆元大關，另也喊出邁向「台灣矽島」的口號，並提出新的國家發展方針—「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²⁰其次，政府也針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進行修訂，以配合整體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此一系列的政策方案明確標示出政府引導我國科技發展趨勢與走向的掌控權不變，且並未因民間化過程中社會異議的湧現而備受阻礙，此舉基本顯示出政府與民間在科技產業發展上係屬合作的局面。

（二）南韓高科技產業政策²¹

韓國工業的起飛始於六〇年代。一九六一年，朴正熙軍閥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總理張勉，希冀將南韓從一個落後農業社會快速轉化成現代工業國，以促成國內經濟繁榮，並同時得以防禦來自北方虎視眈眈之敵人。朴正熙為尋求政府的合法性，以及藉由強力的經濟方案使國家獲得更大的獨佔性，以達南韓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家之目的，因此認為中央政府必須在經濟發展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因為沒有其他南韓機構擁有相同的資源或能力得以在短期內達成如此大

20. 該計劃主要包含十大重點投資計劃，其中有關高科技產業部分為：一、發展國際創新研發基地，提供五百億研發貸款，以活絡創新研發活動；二、產業高值化，希冀籌募一千億元創投基金，協助開發產業核心技術，以提高產業的附加價值。

21. 工業技術研究院，*韓國產業科技政策之研究*（台北：工業技術研究院，1999），頁9~27。

的改革。當時韓國幾乎依賴先進國家以取得生產設施與技術，為促進國家技術自主性的強化，首先於一九六一年成立著名的韓國經濟企画院（EPB），作為最高經濟企画機構，掌管國家發展計畫的擬定與政府預算的執行，並且早在韓國的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畫中，即納入科技發展相關方案。

一九六六年設立韓國科學技術院（KIST），並以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振興法」為基礎，於該年四月成立科學技術處（MOST），成為開發中國家第一個具有部級層次的科學技術專責部門。到了七〇年代，韓國政府鑑於研究機構與業界能力的不足，為推動產業技術之發展，於一九七二年改訂科學技術振興法，設立綜合科學技術審議會，以國務總理為議長，擔任韓國有關科學技術最高政策調整機關的角色，由政府主導開發，強化政府對科技產業的引導地位。一九九八年針對科學技術處進行組織重組，升格為科技部，管理權限擴大至管理科技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同時政府於一九九九年設立以總統為主席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作為國家科技政策最高指導單位，且於二〇〇四年韓國所推動的政府組織再造過程中，將科技部長官提升為副總理一職，再度加強國家對科技發展引導的角色。²²

配合科技政策的擬定，南韓政府也透過經濟發展計畫作為輔助，以達到整體科技產業的突破。八〇年代，第五個五年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一九八二至八六年），尋求將重心自重工業及化學工業轉向至技術密集工業，如精密機械、電子業以及資訊業，更多的注意力則放在製造世界市場大量需求的高科技產品。為使半導體、電腦、精密化學、機械自動化技術與遺傳工程等核心戰略技術扎根，這些項目均被選為國策課題，透過「特定研究開發事業」體制的推動，以結合韓國所有研究開發能力，而構築協同研究體制，並

22. 林品華，「從政府投入面看韓國近年科技發展主軸」，科技政策智庫網。
<<http://thinktank.stpi.org.tw/>>

激發企業參與技術開發投資。此外，韓國政府亦透過稅制的修訂來達到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目標。

制定於一九八九年的第七個五年經濟及社會發展計畫（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六年）的目標為，發展高科技領域，如微電子、新材料、精密化學、生物工程、光學、及航太等。政府及企業通力合作將高科技設備分建於七個省級城市，以平衡全南韓工業的地理分配。一九九二年，展開韓計畫（HAN Project），永遠南韓成為高度先進國家的強烈企圖心。

韓國自六〇年代開始，發展出以大財團為核心的大量生產體制，但是一九九七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讓韓國體認到，長期偏重發展大企業和大規模產業的經濟，已經不能滿足消費者多變的需求，缺乏國際競爭力，面臨無法突破的窘境。美國等一些先進國家技術革新導向的新創企業非常活躍，韓國政府為順應潮流，遂進行政策轉向，嘗試將具有發展性的新創企業，設定為韓國的新經濟模式，冀望新創企業的成长，持續性的技術革新及商業化，可以刺激其他企業或老舊產業，產生擴散效果，帶動國內經濟持續的發展。

一九九九年三月，金大中總統宣佈「Cyber Korea 21」計畫，計畫以「創造新興產業」、「提升整體國家生產力」、「架構知識資訊社會基礎」等為三軸，希冀建設韓國成為創造知識經濟的國家。具體的施政方針，除了加強基礎建設，開放市場自由化之外，還包括培養新創企業，教育內涵資訊化等擴大資訊化基礎的政策。「Cyber Korea 21」不只是口號，其中具備非常有野心以及具體可行之目標的策略性政策。荷盧武鉉就任總統之後，高科技產業發展方面更訂下四大國家資訊科技發展的遠景，並以五年內躋身全球前五大資訊技術強國為新階段目標。²³ 二〇〇一年，推動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

23. 日彥心，「新時代韓國產業科技發展策略」，*科技發展政策報導*，第2期（2006年2月），頁136~151。

基本計畫，對資訊技術、生物技術、奈米技術、航天技術、環境技術、以及文化技術等6T國家策略性科技進行投資，推動科技研發國際化，並計畫於二〇〇四年正式啓動十大次世代成長動力的科技發展工程。

在LCD產業方面，南韓政府自九〇年代，提出相關政策以鼓勵LCD產業之發展，包括研究補助，調降設備的進口關稅，以及降低廠房土地取得的困難度，並提出兩個五年計畫，另提供資金給韓國顯示器產業研究協會進行研發。一九九二年，主導兩項大規模LCD科技研發計畫，積極推動第二代面板基礎技術發展。一九九四年，更進一步輔助研究機構進行相關基礎科技與關鍵零組件開發計畫，至一九九五年，韓國已經進入第二代LCD量產階段，並於一九九六年起，與日本同步進入第三代面板量產時期，技術層次已追上日本與美國先進國家，惟至一九九九年為止，關鍵零組件與設備的進口仍佔生產成本的65%，此乃韓國LCD產業發展的弱勢之處。二〇〇〇年至今，日本與樂金保有第三代以上產能的領導地位，並已成爲全球最積極投入七代、八代顯示器生產的國家。²⁴

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台灣與南韓政府自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雖然面臨政權的轉移，但不變的是政府產業政策的指導性仍然相當的強勢，對於具有扶植性的高科技產業，皆不遺餘力地給予資金、土地、技術、人才等各方面取得的便利性，也提供相當優惠的租稅措施，這些措施皆顯示出，政府亟欲積極扮演支持高科技產業永續發展的推動力量。

（三）TFT-LCD產業在台灣、南韓的發展情形

自一九七〇年日本Sharp公司將美國RCA的液晶顯示器技術商品化後，日本廠商一直是全球液晶顯示器的最大生產國。一九九〇年日本廠商投入三代製程量產，號稱日本「TFT-LCD量產元年」，

24. 日彥，「新時代韓國產業科技發展策略」，頁136~151。

至一九九五年以前，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液晶顯示器面板皆由日本廠商供應，其中TFT-LCD全球市場佔有率更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²⁵因此，全球TFT-LCD市場在九〇年代初期，基本呈現日本廠商獨佔的市場狀況，直至九〇年代中期韓國廠商陸續加入後，以其成熟半導體產業與生產環境，輔以龐大國家資源集中與援手，促使韓國廠商得以躋身TFT-LCD產業龍頭之列的地位，而不再為日本廠商所主宰。九〇年代末期，日、韓兩國也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大幅縮減TFT-LCD產業投資，此時台灣廠商挾個人電腦市場之高佔有率與彈性生產優勢，以雄厚資金積極投入此一潛藏龐大商機的新產業，並得以在極短時間內達到量產階段，使全球TFT-LCD市場產出一波結構性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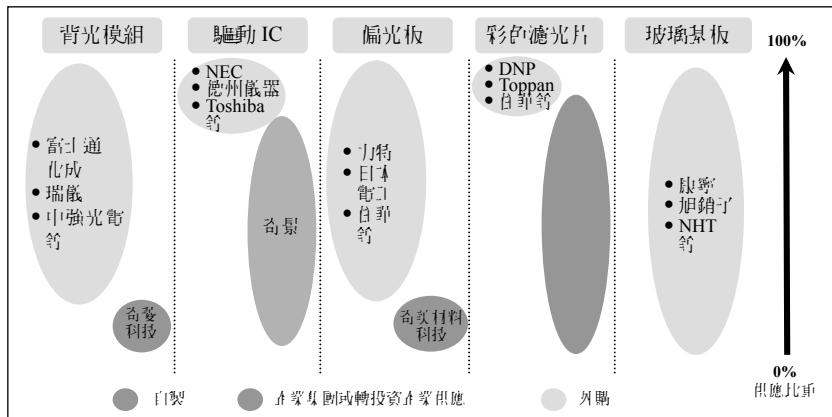
1. 台灣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的發展

台灣發展LCD的動機主要在於國內市場需求，即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的量產之故。一九九三年，第一個LCD產業聯盟組成，但由於對於是否使用外來技術或發展相關技術與工研院合作的爭議，廠商間無法達成共識而解散。一九九四年，工研院電子工業研究所(ERSO)成功推出10.4吋的TFT-LCD原型，一九九五年再次聯合本地廠商，並嘗試持續發展LCD技術。此時，由於產業間技術掌握程度不一，致使政府無從協調共同研發，台灣企業相對來說規模較小，缺乏足夠資金與技術，政府遂直接介入早期的LCD發展，但成效不彰。而後，少數企業率先投入小型尺寸、且所需技術較少的LCD，一九九四年聯友開始生產4吋，一九九五年元太生產5吋。台灣的LCD成長動因係融入全球LCD產品鏈，特別是技術移轉自日本。²⁶

25. 洪世章、呂巧玲，「台灣液晶顯示器產業的發展」，*科技發展政策報導*，第3期(2001年3月)，頁173~183。

26. Suk-Jun Lim and Young-Ja Ba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LCD and Footwear Industrie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ssues & Studies*, Vol. 37, No. 5 (Sep/Oct 2001), pp. 35~75.

台灣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兩年內，躍居全球TFT-LCD市場的前三大供應商，時空背景要回到一九九七年，當時日本漸有廠商放棄殺價競爭激烈的TFT-LCD業，願意提供技術給台灣，並扶植成為策略代工夥伴，台灣TFT-LCD產業的發展方得以突破瓶頸。日本廠商對TFT-LCD產業發展策略的轉變，除願意將技術授權台灣之外，日本廠商將產能外移的結果也形同與台灣形成聯盟關係，間接以台灣制衡韓國在TFT-LCD的強勢地位。但也由此可以看出台灣在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的相對弱勢，亦即台灣的設備能力、關鍵零組件的先進材料開發，乃至產品通路等，仍受限於日本與歐美大廠，由我國兩大液晶面板廠商所呈現的關鍵零組件供應鏈狀況，即可看出（參見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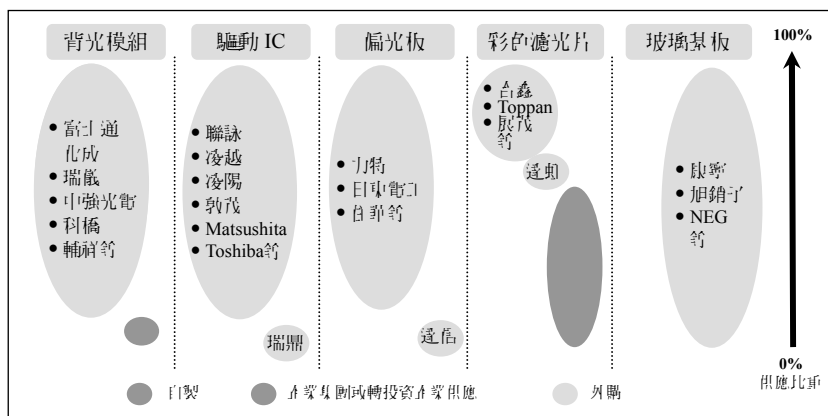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6年4月。

圖1 奇美大尺寸液晶面板關鍵零組件供應鏈概況

不過近年來，由於液晶電視市場蓬勃發展，日本廠商除了Sharp公司仍積極佈局專供液晶電視用大尺寸TFT-LCD面板產製的六代廠以及八代廠，以傾向於透過合併或合資設廠的方式來確保在液晶面板產業的競爭力外，台灣面板也已朝向大尺寸電視面板進行研製生產，目前台灣投入液晶電視面板生產之廠商共有五家，分別為奇

友、友達、廣輝、華映與瀚宇彩晶，但市佔率仍以奇美與友達獨大（參見表 27）。²⁷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6年4月。

圖 2 友達大尺寸液晶面板關鍵零組件供應鏈概況

表 27 2005年台灣液晶電視面板主要廠商之市佔率

廠商	奇美	友達	華映	廣輝	瀚宇彩晶
市佔率 (%)	49	38	8	4	1

資料來源：El 乃慧，「台灣液晶電視面板產業概況」，智網。〈<http://www.itis.org.tw/>〉。

附註：友達與廣輝兩家公司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合併為一家公司，友達為持續公司。

2. 南韓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的發展

八〇年代末期，南韓電子廠商開始多樣化其產品線，其中包括幾種策略性電子產業，例如：TFT-LCD、非記憶性晶片，以及硬碟。這些皆屬關鍵性高附加價值項目，而得以在南韓相當依賴進口的當時適時進入對高階電腦的生產與其他電子產品的供應圈。南韓會切入LCD領域，因其製造過程與DRAM相似，而南韓在該領域已具領導地位，且運用相同的策略，藉著降低成本與快速擴大全球需求，南韓所採策略為，1.比對日本投入更多的資金，2.透過先進製造

27. El 乃慧，「台灣液晶電視面板產業概況」，智網。〈<http://www.itis.org.tw/>〉。

方式達到較高的層次，3.積極運用價格行銷產品。美國因擔心大量投資而不確定獲利率之因素，不願投資LCD，故南韓企業從幾家小型的美國LCD製造廠取得重要的協助，自一九九五年即開始大量生產。南韓政府一向對產業發展扮演扶植的角色，但在LCD產業初發展階段，卻沒有提供任何特別的支持。其原因在於LCD產業特質，LCD的產品鏈既與DRAM重疊，廠商亦不致進入半導體的領域，南韓廠商自然累積LCD發展的基本生產技術，以及能夠運用既有的DRAM行銷網絡。²⁸

目前韓國整體TFT-LCD設備自製率為百分之三十，其中後段製成之設備自製率已經達到九成，而前段製成之設備自製率與我國類同出現相對不足的情形，此亦為目前韓國政府與廠商積極投入發展的部分，希望能在二〇一〇年將上游材料與設備之自製率由百分之三十提升至九十，以擺脫對日本廠商之依賴。

自一九九五年，三星、樂金與現代即選擇LCD作為次世代主要的營運目標，開始大幅投資發展相關技術。三星、樂金與現代自一九九六年共投資7億5千萬美元，一九九七年則投入22億1千萬美元，之後受到金融風暴影響，投資行為才有所停頓。但此投資中斷並未持續太久，次年隨即又展開。南韓企業之所以能夠大肆投資係因這些企業由半導體中獲利甚豐，進而有能力進行轉投資。

儘管自八〇年代開始，韓國電子產業快速發展，且與台灣電子產業發展的過程有其類似之處，如：兩國都是從外國廠商的OEM廠商起家，而成為目前全球電子產業不可或缺的電子產品與零件生產國。但隨後由於韓國相關產業政策方向的轉變，其國內企業集團（三星、現代、樂金、大宇）開始積極佈局與投資，以及由韓國政

28. Suk-Jun Lim and Young-Ja Ba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LCD and Footwear Industrie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ssues & Studies*, Vol. 37, No. 5 (Sep/Oct 2001), pp. 35~75.

府補助之下，韓國電子產業逐步擺脫外國電子廠商的OEM廠商，並且在有些產品的工程技術與設計方面開始超越先進國家。

為了強化企業的競爭優勢，南韓商業產業能源部於二〇〇七年更宣布，三星電子、Samsung SDI、樂金電子與LPL共同成立韓國顯示器產業聯盟（KDIA），這四家廠商將協議面板尺寸標準化，以提高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未來將交叉進行專利授權，互相進行採購，並在產品研發上進行合作。²⁹此處亦可看出，為求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強化，南韓政府仍不遺餘力運用機會介入產業發展的過程，迫使企業間進行合作。

肆、台灣與南韓國家能力消長情形之比較

從台灣與南韓TFT-LCD產業的發展歷程來看，有其相似及差異之處，前者在於產業的萌芽時期，政府透過政策的介入現象並不顯著，直至產業開始進入發展期，政府才積極透過政策力量加以支持，於此同時，由於該產業在資金需求與技術層次要求皆相當高的情況下，台灣政府的角色更被凸顯出來。但另一方面，由於台灣與韓國的企業規模差異性明顯，政府所能施展的空間也因此有所不同，其次，產業發展的路徑也因本身在相關的高科技產業發展之不同，而影響LCD產業在日後的發展。以下將逐一比較分析。

一、LCD產業表現之差異³⁰

韓國LCD產業發展之主要成功因素為較早投入平面顯示器產業，且於一九八三年即派遣人員到美國觀摩與學習相關技術，而非自美國或日本移轉技術，且韓國廠商於一九九四年即具備量產之技術能力，但在政府資源協助方面則不如台灣政府積極。

29. 葉錦清，「論『韓國顯示器產業聯盟』對台灣面板產業的衝擊」，智網。
<<http://www.itis.org.tw/>>

30. 陳賜賢，「東亞四國平面顯示器產業發展現況比較」，智網。
<<http://www.itis.org.tw/>>

日本 TFT-LCD 產業價值鏈整體競爭能力，在上游關鍵材料，原組件以及製程設備的技術能力以及全球市場佔有率上目前仍是領導者。而韓國 TFT-LCD 產業價值鏈的整體競爭能力，在上游關鍵材料，元件以及製程設備的技術能力雖然不及日本領導廠商，然近年來其技術能力上已有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其製程設備上，不僅可供應三星與樂金兩大集團其新世代其產線製程設備所需，近年來亦成功進軍台灣大尺寸 TFT-LCD 面板大廠其產線製程設備。而其下游產品品牌方面，亦積極進行全球市場的耕耘。整體而言，兩大集團除其面板與模組持續擴充產能外，其關鍵材料與元件的自製能力亦多有所強化。另一方面，韓國政府亦積極建置強化製程設備自製能力。

台灣 TFT-LCD 產業價值鏈的競爭能力，除了主要的 TFT-LCD 面板大廠為了持續降低其產成本已積極進行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的競爭佈局動作外，近年來更在其兩兆雙星政策願景的大力支持下，相關企業帶引台灣科學研界投入龐大的資源進行相關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同時並積極透過大型招商會吸引國外擁有技術的大廠到台灣進行設廠或是設置研發中心。但其下游品牌方面，台灣至今仍難以借助品牌優勢來帶動大尺寸 TFT-LCD 產業相對高毛利的環境。

因此，台灣與南韓其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的發展上最根本之差異性即在於品牌地位的奠定。南韓廠商以財團式經營著稱，掌握較強的資金從事技術與品牌的開發，也因此其發展過程可較不依賴政府資源的挹注，不僅可輕易擺脫政府的操控，亦可專注於自有品牌的營造；但台灣主要倚仗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策略，故而在企業發展資金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之際，便較依靠政府其政策方面的支持，也因此較不注重品牌的經營。

二、政策與產業之互動

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在台灣的發展環境，舉凡研發經費、租

稅、水電、土地優惠等獎勵措施，政府皆大力支持並擬定相關配套措施。台灣投入 TFT-LCD 產業的時間雖然較晚，但仍得以後來居上的原因之一，係台灣每月由政府提供一億四千萬元之經費，作為業者提升研發與生產技術能力之用，台灣業者顯然受惠於政府頗多。其次，在稅賦優惠措施方面，台灣的液晶顯示器廠商享有自營業日起五年內免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優惠，雖然南韓業者也享有此優惠，但是較台灣業者不利的是，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首屬中央，一則無須繳交地方稅，再則一旦需要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最高只有百分之廿五的稅率。相形之下，南韓的營所稅率與地方稅皆為百分之廿八。對此，經濟部產業技術服務推廣計畫中心曾統計，若單純以稅賦來看，南韓廠商負擔的稅負約為我國廠商的一點三倍。³¹

金融風暴造成日韓 LCD 投資的減緩，因而帶起台灣的投資潮，政府提供低利貸款，並提供一百萬美金協助成立台灣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產業協會，且 LCD 設備進口可享低利貸款與降低關稅。與南韓相較，台灣的 LCD 產業更依賴外國技術與政府支援，但比較不依賴海外市場。

但目前韓國政府並無擬定特定之政策支持韓國設備產業之發展，或針對顯示器之研發計畫，亦未針對 LCD 產業進行保護，只有類似台灣之科專計畫，與民間合作共同投資並進行開發之輔助措施，因此，基本上韓國政府對 LCD 產業之優惠政策不如台灣政府對廠商之優惠政策，特別是台灣科學園區等之特定區域優惠方案。

此外，韓國廠商將 DRAM 的利潤投入 LCD 產業，因為南韓政府與廠商都有共同的認知，LCD 係 DRAM 的承接產品，企業無須強人與急切的扶植。第二個原因在於當時政府企業關係的全面性轉變，成功的工業化給予廠商更彈性空間以選擇與發展新的策略性產業，而不願意跟隨政府的指導。因此，政府所推出的相關政策，

31. 林明計，「TFT-LCD 舞台亮麗」，*數位周刊*，第 64 期，頁 32~35。

如1996年 TFT-LCD科技發展計畫（1996-2000），以及1997年優勢技術發展計畫（1997-2001），財閥財閥決定進入該產業之際才推出。³²

三、兩國企業結構差異對國家能力之影響

若比較台灣與南韓國家與產業發展的歷程中，實可看出典型的路徑依賴所造成的發展後果。台灣自1980年代研擬經濟發展政策時，因應特殊的政治氛圍與經濟性考量，在經濟活動上確實造成大企業發展的窒礙，進而出現台灣中小企業發展活躍的狀況。但自面臨科技發展日易月新，且全球化日漸深化的狀況下，中小企業反而較不利於科技產業的發展，尤其面臨強調經濟規模的時代中，企業亟需龐大的資金投入相關技術的研發，此時，政府反而成爲主要調度相關資源的主力，也促使台灣的國家能力與角色進入競爭日漸激烈的環境中，更能展現其影響力。

但另一方面，在南韓，卻因爲在產業發展初期，政府極力扶植財閥，進而造成財閥在經濟勢力逐漸壯大，並可以倚仗自身與外資的相關資源進行產業決策時，開始脫離政府的控管，而出現所謂的「三巨頭共和國」，³³即可理解財閥在南韓的勢力已不再受到政府的箝制。此意味著南韓政府對於大財團的發展確實已脫離發展型國家的模式，只能透過相關基礎建設的引導方式，來介入企業的經濟活動，所能發揮的實質力量開始逐步減弱。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爲南韓缺乏中小企業，因此在 TFT-LCD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造成少數財團無法依賴較爲弱勢的中小企業，填補該產業相關零組件的發展真空，進而必須外仰給台灣企業以爲支持。因此，南韓政府近年來的政府角色與企業影響力逐步轉進到大力扶植該國的中小企業發

32. Suk-Jun Lim and Young-Ja Ba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LCD and Footwear Industrie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ssues & Studies*, Vol. 37, No. 5 (Sep/Oct 2001), pp. 35~75.

33. 訪談紀錄，2007年4月。

展，這也意味著，南韓政府仍試圖彰顯她的企圖心，但呈現力不從心之貌。

四、實際案例與理論的對話

发展中發展型國家採取一種所謂「追趕」(catch-up) 策略，在該策略的促動之下，並不會產生發展終點的概念。相反的，在一個高度國際化的經濟環境下，追趕行為產生了一個新的競爭邏輯，為了保持經濟運作的持續有效，國家中心須持續保持因應經濟環境的變動，以及在政策執行層面上的彈性。因此，全球化並沒有導致民族國家機器的空洞化，而是朝向「競爭型國家」轉型，以全球為尺度進行再管制行為。從本節兩個案例觀之，台灣持續運用政策力量支持相關產業的發展，而產業也並未表達排斥之意；但南韓國家力量則確實出現變化，只是尚無法全然擺脫介入的操控意識，從指導轉而扮演引導的角色。

從全球化或資訊化時代的角度來看國家角色的轉變，確實出現發展型國家論述必須進行部份修正工程的徵象。從現今所謂第三波全球化的發展來看，其演進動力在於資訊，即便資訊的複製成本不高，但掌握相關技術卻成為各國或各企業競爭力的來源。南韓政府自金泳三擔任總統時，即開始資訊基礎社會的營造，金大中上台後，隨即提出「Cyber korea 21」，「E-Korea vision 2006」等科技政策，並投注相當程度的預算，此舉反而凸顯進入第三波全球化，與製造業盛行時相異的基礎建設的重製過程，還是需要國家集中資源來提供，遠非一般單一企業之力所能達成。惟作者所觀察南韓國家之變化在於也諳財閥早已脫離政府之控制，但其中小型企業之不振卻一直是南韓經濟的弱點，而今國家力量已轉變關注的對象，將政策所掌握的資源轉移到中小企業上；而針對台灣產業發展與國家力動的層面分析中，更因為企業規模在政策的型塑下，無法承擔龐大

的研發資金與品牌市場的開拓，因此也需要政府相關政策的引導與扶植。這也是國家角色始終能夠立足於經濟舞台上的原因之一。³⁴

34. Manjae Kim, "The Role of State in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ization in Korea," *Society in Transition*, Vol. 34, No. 2 (2003), pp. 338~349.

參考書目

一、中文

- 工業技術研究院，**韓國產業科技政策之研究**（台北：工業技術研究院，1999）。
- 工業經濟研究中心，**韓國科學技術振興政策**（台北：工業技術研究院，1989）。
- 呂乃慧，「台灣液晶電視面板產業概況」，**智網**。〈<http://www.itis.org.tw/>〉
- 呂彥文，「新時代韓國產業科技發展策略」，**科技發展政策報導**，第2期（2006年2月），頁136~151。
- 陳健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租稅優惠措施實施成效評估及其修正方向對台灣經濟的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第5卷第1期（1999年），頁75~87。
- 林品華，「從政府投入面看韓國近年科技發展主軸」，**科技政策智庫網**。
〈<http://thinktank.stpi.org.tw/>〉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編，**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八十二年版）**（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94）。
- 林明正，「TFT-LCD舞台亮麗」，**數位周刊**，第64期，頁32~35。
- 洪世章、呂乃玲，「台灣液晶顯示器產業之發展」，**科技發展政策報導**，第3期（2001年），頁173~183。
- 張俊彥、游伯龍編著，**活力：台灣如何創造半導體與個人電腦產業奇蹟**（台北：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與時報文化出版社，2002）。
- 陳賜賢，「東亞四國平面顯示器產業發展現況比較」，**智網**。
〈<http://www.itis.org.tw/>〉
- 葉錦清，「論『韓國顯示器產業聯盟』對台灣面板產業的衝擊」，**智網**。
〈<http://www.itis.org.tw/>〉
- 劉大均，**美、日政府協助業界（含中小企業）開發產業技術之相關制度研究**（台北：經濟部研發會委託研究計劃，2000）。
- 劉鴻暉，「民主化與產業發展之政治經濟分析」，**林雲漢、包宗和編，民主轉型與經濟衝突一九〇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台北：桂冠出版社，2000），頁181~208。
- 蕭全政，**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國際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90）。

曹宛之,「台灣產業政策成效之初步評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42期(2001年6月), 頁67~117。

嚴正等編, *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二、英寸

Amsden, Alice,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erry, Judith, "‘Big Deal’ or Big Disappointment? The Continuing Evolu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3 (Sep 2005), pp. 327~354.

Evans, Peter, *The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D. Rues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Johnson, Cha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60.

Kim, Eunmee and Jiyoung Kim, "Developmental State vs. Globalization: South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98," *Kore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32, No. 2 (2005), pp. 43~70.

Krugman, Paul,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1994), pp. 62~78.

-----,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0).

Lim, Suk-Jun and Young-Ja Ba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LCD and Footwear Industrie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ssues & Studies*, Vol. 37, No. 5 (2001), pp. 35~75.

Minns, John,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6 (2001), pp. 1025~1043.

Park, Bae-Gyoon, “Spatially Selective Liberalization and Graduated Sovereignty: Politics of Neo-liberalism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South Kore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4 (2005), pp. 850~873.

Weiss, Linda,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ransition: Adapting, Dismantling, Innovating, not ‘Normalizing’,”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1 (2000), pp. 21~55.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聯絡作者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 11114 華岡路 55 號

E-mail:wqn@faculty.pccu.edu.tw

收稿日期：2007/12/12

審查通過：2007/12/26

責任編輯：蔣逸菁

